

新人文主义的
中国影迹

Xin Renwenzhuyi de
Zhongguo Yingji

朱寿桐◎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人文主义的
中国影迹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结项成果

朱寿桐◎著

Xin Renwenzhiyi de
Zhongguo Yingj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朱寿桐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004-7805-8

I. 新… II. 朱… III. 新人文主义学派—影响—学衡派 IV. I209.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0873 号

责任编辑 王 曜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7 插 页 2

字 数 645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新人文主义是一个在汉语语感上既颇有内涵又有超凡脱俗之感的概念，当初舶进之时即激起了不少人的谈论与研究的兴趣。包括鲁迅，尽管对新人文主义未作过任何研习，但还是愿意将之作为一个经常的话题与梁实秋进行争讼。不必讳言，鲁迅当年是出于与梁实秋的意气之争才这样以不屑一顾同时又冷嘲热讽的方式谈论新人文主义和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原不应作为中国现代新人文主义文化的评价依据或研究典例。在中国介绍新人文主义最用力的当然是学衡派文人如吴宓、梅光迪等，以及新月派批评家梁实秋，由于他们的文化倾向和政治色彩的负面影响和消极影响，新人文主义相当一段时间被大陆学术界完全搁置，除了片言只语的批判而外，很少被公正地当做一个文化学术概念为人们所谈论或研究。随着思想解放和现代文学文化研究课题的拓展，特别是被称为保守主义的学衡派以及梁实秋所在的新月派以某种神秘的傲然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之后，新人文主义才在中国的学术文化中恢复了一些精气神。梁实秋特别是其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学衡派的研究则已从文学、历史、思想等领域铺开了相当活跃的扇面，然而与此相关的新人文主义研究尚具有很开阔的余地。人们有时对人文主义的认知很模糊，甚至会有意无意地含混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界限，更不用说对新人文主义的确认以及对新旧人文主义之间关系的把握了。白璧德当年竭思殚虑地对他所倡导的人文主义与传统人文主义之间的原则界限所作的声嘶力竭的辩解，被此一时期中国的研究者证明为既非常必要同时又几乎徒劳。

“人文”一词在西方始用于 15 世纪末，当时意大利人用 *umanista* 指称古典语言和文学，后来出现了人文学科（*studia humanitas*）一词，其中尚包括法律等与人性修养和制约相关的所有学问。1808 年德国教育家尼特哈麦（F. J. Niethammer）推出“人文主义”（Humanismus）概念，乔治·伏伊格特（George Voigt）于 1859 年出版的《古代经典的复活》将此概念当做一个正式命题加以使用，此书的另一名称是《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次年，经过伯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中的响应和更广泛的运用，人文主义成为西方学术文化中的一度流行的命题。此后，各种各样的来自不同领域的新人文主义啸聚而至，其中包括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白璧德并不十分乐意用新人文主义这样的概念，但他又不愿意将自己的思想理念与传统人文主义混合在一起，于是不得不默许人们将他的人文主义称作新人文主义。当然，人文主义与新人文主义的问题远远不在于概念论辩本身。任何一个问题如果只是通过概念的论辩就能解决，那这一定是十分简单甚至并不成问题的问题。人文主义与新人文主义及其相互关系显然都不属于这样的问题。

人文主义的复杂性甚至是阿伦·布洛克（Alan Bullock）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这样有分量的著作都难以充分揭示，虽然他已经从约克·克里斯多夫·伯克哈特所著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等论著中找到了足够的证据，说明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和意念理性概括为人文主义，也许是四五百年以后的事情，并且在他看来这样的概括已经迅速过时，至少在欧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诉之于中国文化的历史，布洛克似乎又改口了，说是“人文主义传统是西方特有的，举例来说，在印度和中国文化里，没有与它相应的东西”^①。他否定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人文主义特性，同时又肯定了人文主义的西方传统，与他在谈论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品性时的那种低抑的姿态形成鲜明的对照。其实，如果仅仅是从历史形态而言，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当然只能属于西方，在中国演示的任何哪怕是最相像的形态也不能被称作人文主义，但如果从意念理性形态进行内涵性的考察，则人文主义可以用来指称任何国度任何时代相类似的文化

^① [英]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274 页。

思潮和思想运作。布洛克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主义联系的可能性，与另一些西方学人肯定“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主义的”^①，都属于外人的隔靴搔痒式的议论。既然中国文化人和文学家愿意将中国某一时段的文化思潮或某一流派的思想运作称为人文主义，则外人应不能仅凭借对于西方历史形态的人文主义的记忆予以否认。

在新文化领域，人们看到胡适首先明确地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人文主义”。1933年，胡适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著名演讲，在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意义时，胡适说：“它也是一场人文主义运动。”^②无论这样的说法是否可靠，但足以证明，胡适他们是在意念理性的意义上而不是在历史形态上沿用人文主义概念的。人文主义只能在意念理性的意义上被反复而灵活地使用，诚如福柯所说，“人文主义”“是一个主题，或者更是一组超越时间、在欧洲社会的一些场合重复出现的主题”^③。因而将它用在突出地体现着人文主义主题特征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方面，自然没有什么不妥。不过与此同时，新文化阵营所竭力反对和背叛的传统文化也同样被称为人文主义，特别是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直接影响的学衡派文人，以及张扬儒学人文主义的新儒家，都纷纷取用人文主义概念。这里出现了一种尴尬的“错位”：信奉传统文化的那部分反而须用新人文主义进行比附，而反抗传统文化的新文化部分倒可以在传统人文主义那里找到某种对应。这样的错位感乃基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尊重传统抗议新潮的根本意念，而传统人文主义虽然也包含着传统的尊重但却鼓励新潮的涌进。尽管知道新人文主义作为概念是如何地宽泛并充满着可能的歧义，但至少为了对新旧文化阵营所共同取用的人文主义概念实施有效的区别，在我们的学术阐论中还是不得不沿用新人文主义这一命题，以避免与新文化唤起的人文主义记忆和感兴相混淆，同时唤起对于西方式形形色色的新人文主义中对于中国影响最大的白璧德人文主义的一种天然的联想，这样的联想对于我们的论题不仅十分有益，而且至关重要。

① 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② 朱维铮：《何谓“人文精神”？》，《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10期。

③ 转引自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8页。

新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理性；在理性旗帜下克制人性的放诞和情感的泛滥而保持内心的自省与自律，是新人文主义的心理学思路；新人文主义的伦理学理念则是通过这种内心自省和自律达到道德完善。这种从哲学基础到心理学思路再到伦理学理念的思想构架，形成了新人文主义的内宇宙系统观。同时，新人文主义还有一套外宇宙系统观：以意念理性观照和批判现实。新人文主义的主要理论功能是意念理性意义上的批判与观照，而不是价值理性意义上的倡导与号召，更不是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推行与实施。意念理性是新人文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其在中国的若干影迹中得以确认、把握的重要参照指数。

新人文主义在现代中国的最主要的承继者和信奉者当然是学衡派文人，其次是梁实秋。梁实秋张扬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历时最久，用力甚殷，影响也最大，然而他对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理解远没有学衡派文人深透而全面。梁实秋只是继承并在一定程度上弘扬了新人文主义的文学批评传统，因而相对于学衡派的道德人文主义等形态，他所树立的是文学人文主义。文学人文主义不是梁实秋本人的命名，只是根据他的学术情形所作的特征性描述和概括，这样的概括虽无所本，但既然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 1912—1991）曾试图提出过“美学的人文主义”^①，基于梁实秋的文学实际和批评实绩，作文学人文主义的概括应不至于唐突。

在新人文主义的话题上不能漠视林语堂的存在，尽管他并不总是坦率地承认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对他的影响，但他是白璧德的众多学生之一，而且在漫长的人生感悟和文学追寻中对于新人文主义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萦绕和期待，只不过他更偏向于个人性情的表达与张扬，姑且概称为性情人文主义。也许林语堂的这种性情人文主义不能完全视为新人文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一种轨迹——原因是林语堂虽然最终承认自己皈依了人文主义，但他并不爽快地承认皈依的其实就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这样的期期艾艾和躲躲闪闪对我们的判断形成了巨大干扰；何况他在人生壮年的相当长一段

^① “弗兰克·兰特里夏指出，通过把文学和现实都划入审美范畴，弗莱的‘美学的人文主义’弥合了新批评在两者之间划出的裂缝：‘（对弗莱而言）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创造性的（因此是向心的、文学的、非指称性的）。不仅人类的行为，而且人类的话语，都是不能摹仿的。我们以一种可疑的宽阔胸怀欢迎来自其他学科的同行，把他们看做诗人一样。’”〔美〕杰拉尔德·格拉夫：《自我作对的文学》，陈慧、徐秋红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时间并不生活在中国。不过，这并不妨碍对新人文主义与他的文学和思想进行影响研究。如果有可能，这样的影响研究还可以在新人文主义与陈寅恪、汤用彤等学衡派外围文人之间展开。

新人文主义在新儒家们所信奉的儒学人文主义中有着深深的投影，特别是立足于意念理性建构的新儒家，如熊十力、贺麟、冯友兰等，在坚守儒学传统的基础上力主开放，新人文主义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开放的对象与目标。当然，这样的思想和文化现象并不能视为新人文主义在现代中国的行迹或轨迹，甚至也不能称为新人文主义对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我们只是从他们的思想契合中，从他们的意念理性的观念形态中，搜寻到新人文主义或清晰或模糊的影像。这样的影像还突出地体现在辜鸿铭不可替代的文化著述之中，他对白璧德最为尊崇的思想先驱阿诺尔德的推崇与笃信，使得这样的新人文主义影像显得特别有根基。

于是，新人文主义在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运作中，既通过学衡派文人和梁实秋留下了虽然不连续但尚算清晰的运行轨迹；也通过林语堂、陈寅恪、汤用彤等人造成了或明显或淡漠的，或深刻或浅泛的历史印象；还通过熊十力、贺麟、冯友兰等新儒家，以及先驱者辜鸿铭，体现出一种或清晰或模糊的影像。由此，综合成、会聚成、组构成，然后被概括为：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

前言 (1)

导 论

新人文主义与现代中国文人的文化认知

第一章 新人文主义：西方背景及中国场域的概念论辩 (3)

一 关于新人文主义的概念 (3)

二 新人文主义的宽泛倾向 (7)

三 新人文主义理性形态 (11)

第二章 中国新人文主义文人群体的确认 (16)

一 白璧德主义的现代认知 (16)

二 中国新人文主义文人群体的确认 (20)

三 新人文主义及其中国影迹 (26)

分论一

辜鸿铭与中国新人文主义的前奏

第三章 辜鸿铭与新人文主义的理论关联 (31)

一 文化怪胎的人文主义理解 (31)

二 面向世界、面向现实的新人文主义意念理性 (42)

三	道德本体的人文政治理念	(54)
第四章	辜鸿铭的文学倾向及其与新人文主义的契合	(78)
一	辜鸿铭的文学批评本体特征	(78)
二	辜鸿铭的文学观与人文性情	(97)
第五章	辜鸿铭人文主义历史文化价值	(114)
一	不同角度的历史认知	(114)
二	辜鸿铭与历史文化屏蔽现象	(120)

分论二

新人文主义的中国主体:学衡派

第六章	新人文主义内宇宙系统——理性人文	(135)
一	新人文主义概念之进一步辨析	(135)
二	理性的深度及其古典意蕴	(139)
第七章	新人文主义内宇宙系统——道德人文	(148)
一	内心自省与道德实现的途径	(148)
二	人文道德与宗教道德	(159)
三	道德与文学的理论关联	(171)
第八章	新人文主义外宇宙系统——古典人文	(188)
一	新人文主义的古典主义文化情怀	(188)
二	新人文主义与古典主义的共同理性	(195)
三	人文主义的秩序意识与古典主义的规范化	(206)
第九章	新人文主义外宇宙系统——儒学人文	(223)
一	儒学人文法则：执中持正	(223)
二	儒学人文主义与仁学	(239)
三	人文道德与人道主义	(244)
第十章	新人文主义外宇宙系统——实证人文	(252)
一	实证人文主义的现实关怀	(252)

二 人文关怀的现实理路	(258)
三 对经验层次的意念性超越	(272)
四 新人文主义的社团实践	(290)

分论三

梁实秋的文学人文主义

第十一章 文学人文主义的确立	(307)
一 梁实秋与新人文主义关系的复杂性	(307)
二 意念理性的选择	(314)
三 文学人文主义的批判视角	(318)
第十二章 文学的纪律：新人文主义话语权	(325)
一 态度的严重性与文学的纪律	(325)
二 文学纪律的批判视野	(331)
第十三章 人文主义与古典主义意念理性	(337)
一 意念理性意义上的古典主义倡言	(337)
二 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	(342)
第十四章 文学人文主义的理论张力	(355)
一 古典主义的意念理性及时代意义	(355)
二 永久性与人性	(359)
三 文学人文意念的辐射力	(367)

目
录

分论四

林语堂的性情人文主义

第十五章 复杂的新人文主义感兴	(375)
一 对于精神故乡的意念沼泽现象	(375)
二 与新人文主义的思想邻壑效应	(386)

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

第十六章 性情人文主义的阐示	(396)
一 与新人文主义的分歧：近情、个人化	(396)
二 一个近情的性情人文主义者	(413)

综论一

新人文主义的文学审视

第十七章 新人文主义与中国文学界	(439)
一 白璧德的感召与意念影响	(439)
二 学衡派的“拖累”及梁实秋的发现	(443)
三 白璧德在中国文学界的妖魔化	(449)
第十八章 中国新人文主义思潮的文学品性	(460)
一 新人文主义思想资源的片面性开发：归敛于文学	(462)
二 新人文主义理念的偏向性表达：聚焦于文学	(468)
三 新人文主义写作的文学化形迹：批评本体建构	(477)

综论二

新人文主义的文化论析

第十九章 新人文主义的意念理性及其中国影像	(493)
一 新人文主义的意念理性特征与品质	(493)
二 新人文主义意念理性的中国影像	(502)
第二十章 儒学人文主义与新人文主义	(516)
一 疏离意念理性的儒学人文主义	(516)
二 儒学意念理性与新人文主义	(527)
后记	(541)
参考文献与资料目录	(544)

导 论

新人文主义与现代中国文人的 文化认知

1. *Leucania* *luteola* (Hufnagel) *luteola*
2. *Leucania* *luteola* (Hufnagel) *luteola*

第一章

新人文主义：西方背景及 中国场域的概念论辩

一 关于新人文主义的概念

新人文主义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是一个内涵复杂、外延漫漶且争议丛生的概念，对这样的概念进行学理的辨证，是一件既十分艰难却又并非没有必要的事情。

在西方，新人文主义原有多种指涉，后来随着白璧德主义的国际影响的增大，此一概念渐被用来指称白璧德主义。中国的新人文主义其中坚力量，显然是以吴宓、梅光迪等白璧德嫡传弟子为代表的学衡派。正是这一派文人将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引进到中国，并且运用他们所能操纵的各种文化资源阐释和宣扬白璧德及其新人文主义，使得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思想史、文学史上鲜明地产生了新人文主义的标识，并历史性地留下了新人文主义的思潮印记。新月派的梁实秋以及梁氏到台湾后的传人如侯健^①等是中国新人文主义的另一脉宣传和鼓吹的力量，他们同样以白璧德的文化哲

^① 中国台湾学者，曾留学哈佛并以白璧德学说为学位论文选题，不仅以梁实秋的弟子自处，而且很自觉地将梁实秋的老师白璧德奉为“太老师”。

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

嗣自诩，其长达数十年的努力形成了新人文主义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到 80 年代不绝如缕的文化脉息。在广泛而略显粗疏的意义上，几代新儒学家的思想和理论实践客观上呼应了新人文主义的观念倾向，从而强化了中国新人文主义的学术厚度和时代影响力，而辜鸿铭对同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理论资源的阿诺尔德学说的继承与发扬，可被视为开启了中国新人文主义思想影迹的历史序幕。

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新人文主义概念内涵在中国的学术研究界则不可谓十分清楚。甚至，人们由“五四”新文化运动而领悟的人文主义也是相当模糊的概念。人文主义和新人文主义作为概念，不仅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而且都具有特定的西方文化背景，在被引进中国的文化和理论场域之后，必然面临着若干问题的辩证。

新人文主义是一个内涵十分复杂的思想价值体系，或者说，它从创立阶段开始一直到它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都未能形成稳定的思想内涵和价值理念的外延，即使在它已经成为历史名词的今天，人们也很难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作一明确而轻松的界定。一种影响过大、拥趸过多的文化思潮总难免会这样，内涵复杂而外延模糊。但来自美国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显然并不属于这一类，论影响它从未超出过读书界，更准确地说只是局限于文学批评界，它的拥趸当年在美国也不过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而已，在中国便是学衡派一脉数人，以及新月派批评家梁实秋。新人文主义概念的复杂性以及外延的模糊性，从根源上说来自于它产生方式的普遍相对性，也就是说是在几组相对关系的理论架构上凸显出来的，厘清这些理论关系本身就是相当复杂的事情；从源流上说它来自不断的重释与发挥，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经过他同时代人如穆尔、谢尔曼的发挥与补充，到了中国又经过学衡派和梁实秋联系儒家文化传统加以重释与阐扬，这样的重释与发挥会导致新人文主义外延的漫漶与模糊。

新人文主义本来就是在相对于人文主义这一现成概念的意义上提出来的，就白璧德而言，更确切地说，“新人文主义”实际上是被别人赋予的概念。白璧德在自己所倡导的观念上原并未另想冠名，他更愿意沿用旧有的人文主义概念；虽然他有充分的理由同时也有足够的热忱证明自己的主义与旧有的人文主义有着多么显豁的差异。白璧德自己并不十分满意将他的思想体系概括为新人文主义。据 D. O. 格罗斯林介绍，在他那个时候的

美国，新人文主义概念已经出现，人们将它用来概指神学人文主义。白璧德将自己的人文主义径直称为“人文主义”或者“美国人文主义”。格罗斯林还观察到，白璧德只有一次用“新人文主义”指称自己的思想，那还是为了避免使自己的思想与科学人道主义相混淆。^①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在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前面冠一“新”字，乃是后来“新教育”、“新自由”、“新批评”等一系列“新”字号时髦词语催生的结果。^②这就是说，“新人文主义”对于白璧德学说而言其实不算是一个稳健的指称，故而对白璧德比较尊重的学者在谈论白璧德话题时往往倾向于避免用“新人文主义”概念。1986年为纪念白璧德逝世50周年，在美国出版过一本题为《我们时代的欧文·白璧德》的论文集^③，收有正式论文9篇，只有Russell Kirk的*The Enduring Influence of Irving Babbitt*一文仅一次提到过“新人文主义的凄苦的希望”（第20页），另有Folke Leander的*Irving Babbitt & Benedetto Croce*一文讨论过“New Humanism”与“Neohumanists”的词语关系（第85页），除了诸如此类偶尔的现象而外，研究者全部使用了“人文主义”或“白璧德人文主义”这样的提法。

学衡派在20世纪20年代尽管有时循惯例将其指称为新人文主义，但也并未将新人文主义当做一个固定的概念一成不变地加以使用。在整个《学衡》杂志中，有关白璧德思想的译介文章使用“新人文主义”不过13次，而使用“人文主义”概念则达207次之多，可见“新人文主义”在学衡派文人的述介中也不过是一种临时的概念，随意的指称。事实上，比起新人文主义来，他们宁愿将白璧德的学说以“白璧德之人文主义”这种更加临时的指称称之，这样的指称达15次，超过了新人文主义的概念使用频度。真正将新人文主义作为概念固定下来的是后来梁实秋的推介与宣扬。梁实秋坐定新人文主义的概念，一方面对此一概念在汉语中的定型以及学术普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白璧德主义

^① Dom Oliver Grosselin: *The Intuitive Voluntarism of Irving Babbitt*, p. 5, St. Vincent Archabey, Latrobe, PA. 1951.

^② Milton Hindus: *Irving Babbitt, Literature, and the Democratic Culture*, p. 3, Transaction Publishers, New Brunswick, 1994.

^③ *Irving Babbitt in Our Time*, Edited by George A. Panichas and Claes G. Ry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